

《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摘要

狭间直树、石川祯浩主编：《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袁广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各章的摘要，引用框内的为石川祯浩在序言内的总结，其余的为参照正文补充的内容。

目录

序言（石川祯浩）

中江兆民《民约译解》的历史意义——“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史之思想篇（狭间直树）

为什么要翻译*On Liberty*——对比中村正直《自由之理》与严复《群己权界论》（高柳信夫）

从“天演”到“进化”——以鲁迅对“进化论”之容受及其展开为中心（李冬木）

清末民初中日文法学交流初探（袁广泉）

近代“中国哲学”发源（桑兵）

十九世纪末日中两国“記念”的语义变化（小野寺史郎）

“主权”的生成与“宗主权”——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与西藏、蒙古（冈本隆司）

“Civil Engineering”一词及其概念之翻译——探索“公民技术”的原意（武上真理子）

清末中国吸纳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路径考——以梁启超为中心（森时彦）

日中近代的编译百科全书（石川祯浩）

“东亚病夫”与体育——以殖民地男性特质为视点的观察（高岛航）

中国共产党史中的翻译概念——“路线”与“コース”（江田宪治）

序言（石川祯浩）

一般认为，日本人掌握汉语比较容易，而中国人学习日语，也比学习其他语言轻松。其主要理由是，两国都使用汉字，许多汉字词是相通的。然而，这种情况只是最近百年才形成的。因为，众所周知，日本在明治时期开始努力引进西方文明后，曾应用汉字词创造出许多对应西方语句、概念的译词，而这些译词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入中国，并融入汉语。

如果换一个角度，不妨说，日语在明治时期的上述变化是与引进（新创）汉字词汇并行的，因而使同时期包括汉语在内的东亚各国语言甚至思考模式为之一变。中国近代学术史大家桑兵教授曾把中国引入日本创制的译词后发生的变化概括为“发汉音，说日语，用西思”。也就是说，当时中国人议论问题，口中语音无疑是汉语，但语词却来自日语，而贯穿这些语词的则是西方思考方式。由此可知，明治日本创制的译词对中国影响之大。不过，中国是如何接受西方的概念及思想的？具有深厚底蕴和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如何因应属于不同体系的西方文明的？这些深层次问题，抛开日语的媒介作用就难以回答。

我们这次组织的“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研究，尽管课题设想及成员都部分地继承了“梁启超研究”，但绝非其单纯延续。“梁启超研究”致力于探索梁流亡日本时所接触的各种西方学说、思想、概念的来源（即日文著作的蓝本）；而此次则侧重诠释东亚传统文明体系与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接触和融合在文明史上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包括重新审视日本接受西方文明（以及江户末期传至日本的介绍西方的中国书籍的影响）的过程。梁启超曾在其间留下清晰足迹，自然应继续予以充分关注；但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知识分子在理解近代西方、翻译西方文明的关键性概念和思想时，他们原有的知识及学养（很大程度来自儒教）曾发挥怎样的作用？日中两国是否存在差异？显然，此类问题无不属于思想史研究范围。

有鉴于此，我们这次的研究并不采用“词汇史”研究——利用近年日渐充实的数据库来检视某语句或词语何时出现、使用频率如何——的方式。因为，这类研究在“国语学”“语言学”领域已达到相当高水准，史学家趋步其后也难有更大收获和贡献。再者，搜寻某词何时开始使用当然有其意义，但我们并不单纯地据此认定有关事物即开始于此，而是要思考如下问题，即该译词（或概念）是在怎样的文化和思想背景下产生的？即使其为日本和中国共同拥有，在文化、政治背景迥异的情况下，两国在理解同一概念时伴随着怎样的偏向或差异？所以，贯穿我们研究的是如下假说，即“东亚文明圈”是伴随着这种偏差和差异而在整体上回应和顺应近代西方文明所形成的。

中江兆民《民约译解》的历史意义——“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史之思想篇（狭间直树）

狭间论文探讨的是西方近代思想具有标志意义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其翻译（中江兆民译《民约译解》），是本文集的总论。《民约译解》的特点在于，它是未采用当时尚不固定的“新汉字词”而获得成功的汉译。狭间通过分析兆民选用旧有汉字词翻译卢梭该著的意图后指出，兆民坚信拥有丰富词汇的汉文足以翻译西方思想，中国传统思想（儒教）的积极部分具有约束君权的本质，而兆民对此把握极其准确。在此基础上，狭间还详细探究明治、清末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契约论》译本，并具体提示了当时人们是如何理解这部名著的。

为什么要翻译*On Liberty*——对比中村正直《自由之理》与严复《群己权界论》（高柳信夫）

高柳论文围绕日本和中国最负盛名的翻译家即中村正直和严复都曾翻译过穆勒著《论自由》这一点展开论述。只不过，该文并非对同一原著的不同译本做单纯比较，而是将两种译本分别置于和译者其他代表性译著及著作的关系、脉络中进行分析，从而探讨《论自由》的意义。比如，高柳认为中村正直的《西国立志编》并非否定旧有价值观（即儒教价值观），而严复则在其《救亡决论》一文中对墨守名教表示疑义，而这则是二人翻译《论自由》的背景和目的所在。此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中村正直通过标注注音假名使译文尽量通俗易懂，他希望更多人了解这本书，他认为即使是普通人也能理解穆勒的论述，这可能是因为他从某种性善论的立场来比较乐观地看待人的道德认识能力；而严复采用格调高雅的古文翻译，他认为这本书学理极深，其读者仅限于阅读大量古书的人，可能他认为只要一小部分精英能理解这本书就足够了。

从“天演”到“进化”——以鲁迅对“进化论”之容受及其展开为中心（李冬木）

李冬木论文以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共通时代思想即进化论（社会进化论）为研究对象。该文指出，尽管严复译《天演论》所阐述的社会进化论最初给了清末许多人士以震撼，但后来中国并未出版相关译著，致使论述“进化”的译词即日语文献讨论进化的语词自清末至民国流入汉语，并基于具体事例探究了日本最有名的进化论传播者丘浅次郎对鲁迅的影响。

本论确认了在中国接受进化论思想的过程中，作为其概念载体的语词由严复《天演论》所代表的“天演”系统向加藤弘之所代表的“进化”系统的转变，并在这一背景下，探讨了进化论在鲁迅那里的容受过程，即由严复以《天演论》翻译赫胥黎到杨荫杭以《物竞论》翻译加藤弘之，再到他通过日语直接阅读日本的进化论。在日本的进化论与鲁迅的关系当中，本论在此前研究的上重点探讨了丘浅次郎与鲁迅的关系。

在鲁迅对进化论的容受过程当中，“严复以外”的进化论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日本的进化论与鲁迅”这个问题本身，也许意味若对既往研究框架的某种补充和修正，因为这项研究的展开尚为时日浅，还当做更进一步研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严复的影响和作用可以无视或贬低，而是意味着严复及其《天演论》将被纳入一个新的关于进化论的知识背景下来认识和评估，而关于对严复的重新认识或许就包含在今后新的探讨当中。

在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近代思想文化的交流当中，的确存在狭间直树所指出的所谓“知层”（指潜在的“知识地层”）现象，“翻译词语”和“翻译概念”就在这“知层”当中流动。通过制造者、接受者、使用者的主体筛选，有些作为某种概念被接受，有些概念又被新的词语所表达，从而至今仍然影响到东亚的语言和思想。即使只以“进化论”这一根“通管”向历史纵深探索亦可获知东亚“知层”所曾有过的丰富的思想流动。这并非像某些学者所描述的那样，是对“西方殖民主义”的被动接受，而恰恰体现着来自不同主体的知性创造。“鲁迅”作为这样一根“涵管”，不仅把我们带向东亚近代“知层”生成的生动的历史现场，丰富我们关于东亚近代的知识，同时那里的反射也会加深我们对鲁迅本身的理解和认识。

清末民初中日文法学交流初探（袁广泉）

随着来自西方的翻译概念日趋普及，东亚原有的概念开始解体，并分化为数个不同概念；著名事例之一即“文学”。袁广泉论文概观了“文学”概念的分化与文法（文典）概念发生的关系，描述了文法学受《文学书官话》（1869年）影响，在旧有“文学”概念解体较早的明治日本诞生后，又改变形态回流到清末中国的过程。其所呈现的东亚文明圈“知识”重构的一幕，已超越翻译概念发生与传播的层次。

近代“中国哲学”发源（桑兵）

桑兵论文围绕公认的西方概念“哲学”展开论述，并试图从史学角度回答如下迄今未明确的根本问题，即用“哲学”的概念和范畴把握中国各种传统学术是否恰当。“哲学”原本为表述西方思维体系而创制，其用于东方后，亦即“中国哲学”这一名词产生后，中国的思想和各种学术被迫因应“哲学”而发生变化，有关中国固有“学问”的表述也就一直未能摆脱西方“哲学”的桎梏。通过审视这一状况的发端即“中国哲学”在明治日本的发生过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桑文似乎在自问：中国如何才能恢复属于自己的话语。

十九世纪末日中两国“記念”的语义变化（小野寺史郎）

众所周知，19世纪后半期出现的“新汉字词”中，很多词在日本和中国是共通的。然而，与此同时，有些概念尽管日语和汉语用同一词语表述，但其间却存在概念上的微妙偏移和价值观差异。小野寺论文探讨的就是此类词语之一——“記念”。该文不仅指出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記念”脱胎于日语原有的“かたみ（katami）”（即死者的遗物）并普及开来（从私人领域转用到公共领域）的历史背景，而且诠释了该词在日语和汉语里的不同语感（纪念对象是积极事迹抑或消极记忆之别）是因近代两国发展趋势不同而形成的。

与日语的“記念”不同，汉语的“纪念”只有一种读音，故此前极少有学者关注其语义的历史变化。但如本文所探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纪念”也曾发生过明显的语义转换（或曰扩大）。而其趋向也与日语“記念”由表达个人馈赠到颂扬国民过去荣誉类似。但是，较之日语“記念（kinen）”演变为主要用于积极颂扬，梁启超等所提出并尝试应用的“纪念会”的目的则是毋忘外辱、誓言雪耻，“纪念（jinian）”因此带有不同于“記念（kinen）”的色彩和语感。这种区别，后来更以日本所没有的“国耻纪念日”这一具体形式表现出来。关于这一问题，拟另稿探究。

“主权”的生成与“宗主权”——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与西藏、蒙古（冈本隆司）

该论文因故未能收入中文版。日文原文见：www.zinbun.kyoto-u.ac.jp/~rcmcc/h7-okamoto.pdf

表述近代概念的词语中，规定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的术语，其概念应是清晰而不容随意解释的。“主权”“宗主权”无疑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关键概念，但如冈本论文——《“主权”的生成与“宗主权”》明确指出的语词改变，特别是“主权”一词的形成和词义转换，可谓是在西藏问题上与英国进行“概念战”的结果。在这场概念战中，“主权”一词未变，但其义先则极近“宗主权”，后则明确否定该义。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中国方面将“主权”作为“sovereignty”的对应译词而重新界定其内涵，并与新概念“领土”组合起来。

以下译自日文原文（使用DeepL机翻）：

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在成立后不久就不得不承认外蒙古和西藏的“自治”。这是因为他们屈服于俄罗斯和英国的压力，而这两个国家在这两个国家都有重大利益。因此，这一事件历来被定位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主义和它应该坚守的“边疆”的典型“侵略”案例。

然而，近年来，由于中国革命历史的退缩和民族主义的相对化，这种解释受到了批评。更具体地说，已经形成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中国的立场来分析情况的研究。特别是，不仅列强所扮演的具体角色，而且西藏和蒙古本身的愿望、利益、主体性和政策政策都被确定下来，中国作为压迫者对他们的一面也变得清晰起来。

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积累，清初民政部门的外交关系和国家制度迅速变得清晰明了起来。到目前为止，只能从片面的中国视角来看待“边疆”的历史事实，现在可以更多地从多边和多角度来理解。

然而，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对中国自身利益和愿望的解释有一种倾向，即仍然是老一套的，定义非常广泛。我们对外国和“边疆”的立场和意图了解得越多，就越要加深对中国方面的理解。

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想以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西藏为重点，来探讨这个问题的解决。在清朝崩溃和毁灭的过程中，西藏蒙古人越来越多地提出要脱离清朝和中国，而英国和俄罗斯的军队也在这个过程中纠缠不清。事实过程本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些优秀的研究所阐明了。然而，引发西藏和蒙古分离的原因是清朝/中国干预和控制的加强。它从来都是反过来的。那么，是什么情况导致了中国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态度和行动？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还不为人所知，只能笼统地加以解释。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重点讨论中国和英国关于西藏的外交谈判，以西藏和外蒙古实现“自治”的事件为线索。在下面的章节中，重点将放在中国和英国关于西藏的外交谈判上，以西藏和外蒙古实现“自治”的事件作为参考。

“Civil Engineering” 一词及其概念之翻译——探索 “公民技术”的原意（武上真理子）

不少西方词语，近代东亚知识分子曾苦心孤诣为其寻求译词，但实际上，其中部分词语的概念在西方也尚在形成过程中，且受西方各国背景不同这一因素的制约。武上论文探讨的“civil engineering”即属此类。经过曲折演变，“土木”成为该词的最终译词，但此前也曾有人将其译作“济世之器械”，以使体现近代西方价值观的“civil”契合亚洲原有概念。该文除应用译词研究的常用方法即详细比较各种辞书而明确了译词确定的过程外，还论述了“土木工程学”这一学术领域在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所占据的地位。

清末中国吸纳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路径考 ——以梁启超为中心（森时彦）

森论文主要通过《富国策》《富国养民策》和《佐治刍言》的分析，并与日本江户末期至明治时期相比较，以戊戌变法时的梁启超为中心，论证了“political economy”是通过怎样的渠道为中国所接受的。该文指出，“political economy”的内涵在同时期的西方也不尽相同。此观察极其重要。亦即，虽然同为概述“political economy”的著作，因其所论经济学的学派不同，也会导致读者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该文所举例证之一就是，梁启超读自由贸易论即曾附会公羊派三世说，即其对自由贸易论的理解乃是为变法派立场提供佐证。

日中近代的编译百科全书（石川祯浩）

就体现西方特点知识体系的“百科全书”，石川论文对日本和中国最早冠以“百科全书”之名出版的书籍做了比较。日本的“百科全书”是英文版简易百科丛书的日文全译（1873~1883刊行），而中国的“百科全书”则是抄译自日文著作（1903年刊）。两者的出版前后相差二三十年，其间恰值“新汉字词”表述的翻译概念在日本形成并普及后于20世纪初流入汉语。石川论文对“百科全书”进行探讨后认为，上述一系列动向是东亚语言确立其实标准（de facto standard）的过程。

“东亚病夫”与体育——以殖民地男性特质为视点的观察（高岛航）

高岛论文引用“男性特质”（masculinity）观点，对如下问题做了分析，即“东亚病夫”何以从指代近代中国国家的具有一定标志性的词语转为指称中国人身体羸弱，并因此导致人们试图通过体育来提高个人身体素质（或者说，如果曾经存在这种认识的转换，则其始于何时）？该文注意到，近代男性特质问题在殖民地文化磁场中尤其突出，故以中国近代“体育”发祥地上海的圣约翰学校为例，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男性特质由“文”向“武”（体育）演变的过程。

本文探索了“东亚病夫”与体育的关系，从殖民地男性特质的视角讨论了体育传播与受容的背景和意义。在半殖民地环境中，中国人被迫接受了将自身定义为“对抗的类型”的西方男性特质。这种“对抗的类型”中包含妇女、老人、儿童、病人等，起到了区分成年男性特质的作用。但是“病夫”“东亚病夫”并不是中国人唯一的表象，那是中国人在“对抗的类型”的诸类型中主要选择了“病夫”的结果（这说明在西方并不经常使用“病夫”这个比喻）。因此，西方人将中国人看作“Sick man”与中国人将自身表现为“病夫”之间，即使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也无法成为有说服力的论证。

为什么选择“病夫”呢？世纪交替期的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机，“女”无法成为男，“老人”只能一直衰老下去。与被称为“茶色小美国人”的菲律宾人不同，文明古国中国并不惯用“孩童”的比喻，“病人”只要治愈了就是成年男性，个人水平上的男性特质的恢复容易与国家水平上男性特质的恢复即主权的恢复相重合。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1900年）中反对“老大帝国”这个称呼而提倡“少年中国”，也是因为少年终会成为青年，将中国比喻成少年显示了将来发展的可能性。“睡狮”只要觉醒了就很勇猛。这样他们虽然被迫接受西方男性特质所决定的“对抗的类型”，但还是为将来克服它留下了余地，将希望寄托在其可能性上。“病夫”和“睡狮”就是在这样围绕男性特质的交错磨合中浮现出来的语言。

中国人全是“病夫”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而现实中如何去克服它又是很困难的问题，消除鸦片和缠足是其方法之一，体育也不过是其方法之一。那么为什么“病夫”与体育有强烈的关联呢？其主要原因应该是国际运动会的兴盛，具体地说，是1915年在中国召开的远东运动会。没有比在体育项目中取得国际性胜利更能体现战胜“病夫”的事实。接受“二十一条”后召开的且日本也参加的国际体育赛事中，中国的胜利使体育成为恢复男性特质的现实手段。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大会之后“东方病夫”这个词重新受到关注就绝非偶然。

最后用图式整理本文的论证（图略）。首先，西方的男性特质是作为完整的人的成年男性所体现，与其他人成对抗关系。作为男性特质的属性有西方、基督教徒、健康、正常、成年、男性等因素，非西方、异教徒、疾病、精神和身体残疾、儿童、老人、妇女等则是“对抗的类型”之属性。其次，中国传统的男性特质以“文”为中心而构成，没有“文”元素的人被看作“夷狄”。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基本构造都是自身的优越和他人的劣等，当中国人承认西方男性特质的时候，这个构造发生了逆转（=殖民地男性特质）。体现男性特质的是作为他人的西方人，中国人只能将自我定位在“老大”“病夫”这样劣等的“对抗的类型”位置上。他们被迫这样做的背景，是对国家与民族灭亡（=丧失男性特质）的危机感，以及必须克服危机的强烈使命感，即对西方男性特质的承认与恢复丧失男性特质的意志是密不可分的。“老大”“病夫”的反义是“壮夫”“少年”“新青年”等（国家层面的富强和主权恢复）。体育与其说是克服“病夫”的手段，不如说是获得男性特质的方法之一。因为在西方（特别是19世纪末的英美）体育是为了成为“男人”，而且证明自己是“男人”的主要手段之一。“Sick man”这个词不过是中国人将自己看作“病夫”时将其正当化的道具。考虑翻译问题时追求语言和语言的对应关系当然很重要，但如果忽视其语言所显示的概念的成立背景，则有扭曲论证的危险性，因此本文主要关注翻译背后的力学所在。

中国共产党史中的翻译概念——“路线”与“コース”（江田宪治）

近代东亚的翻译概念，经由日本而传至中国、朝鲜者为多。但人们往往忽视了某些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词句是发源于苏俄并经由中国传至日本的。江田论文探讨和阐明的“路线”这一政治范畴的概念即属此例。因为，在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中，中国显然比日本受苏联影响更大，有关党派的性质及评价的语词，其汉语译词首先是在中国形成的。